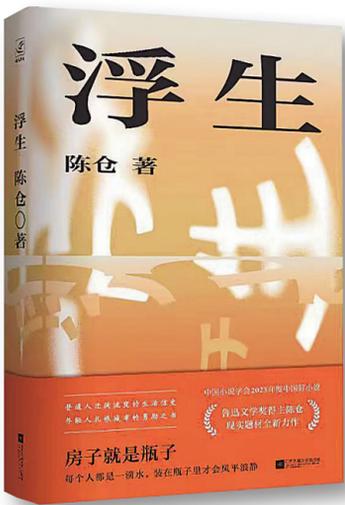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漂泊者何以栖居？

——评陈仓长篇小说《浮生》

□蔡家园



《浮生》，陈仓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

多年前，六六的《蜗居》曾经引发社会广泛共鸣。它讲述的是21世纪之初房价急剧飙升时期，一群上海白领沦为“房奴”的故事。陈仓的长篇小说《浮生》讲述的也是一对“进城”青年在上海买房的尴尬故事，虽然时代环境与《蜗居》有所不同，但是主人公面临着相似的人生窘境——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青年人何以在都市安身立命？

小说的主人公叫陈小元，从农村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魔都的一家新闻媒体当记者。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用世俗的话说，陈小元是跳出了农门的农村娃，可谓出人头地、风光体面了。可时代的魔杖给了他当头一棒——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冲击之下江河日下，报社经营陷入困境，他也面临下岗危机。为了结婚，为了在都市安身，他和未婚妻胥小曼举债支付首付，贷款在城郊的“米罗公元”买了一套房子。就在他们缩衣节食、绞尽脑汁还贷款的时候，发现房子漏水，存在严重质量问题。陈小元带领一帮业主维权，遭到开发商的打击报复。绝望中的他正准备从楼顶“飞身一跃”时，新建成的一栋高楼在他眼前轰然坍塌……

古往今来，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最基本的人生欲求。可是在现代大都市里，年轻人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并非易事，所以陈小元和胥小曼这对外乡人，“对这座城市是迷茫的，是没有方向感的，甚至是漂浮在半空中的”。当他们决定买房子了，“人生有了目标，整个世界有了坐标”。房子对他们而言，既是遮风挡雨的物理空间，也是翻云覆雨的情感空间，还是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可令人感叹的是，就是这个基本“坐标”，竟将他

们的生活引向了难以纾解的困境。房子幻化成无形的“笼子”，完全囚禁了它的主人。他俩本来工资收入不高，现在每月得还1万多元房贷；这个月的贷款刚还完，下个月的又接踵而至。还贷就像绞索，勒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买房子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爱情是在筹集房款的时候得到升华达到高潮的”。可当“这套房子这栋楼像一根柱子，完全支在了他的体内，给予他充

实、信心和力量”时，他其实已被物化，沦为了“房奴”。他既遭到金钱的奴役，也因为生命本能的丧失和精神的缺失而失去了主体性。小说以生动细致的笔触，一层一层揭示了正常人性在“物”的压迫之下，挣扎、扭曲、畸变的过程。

从表面看，《浮生》讲述的是一代年轻人买房的艰辛和苦痛，从深层看，揭示的正是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重大社会问题——进城者何以安栖？他们的出路何在？与所有的优秀作家一样，陈仓避开了对“理所当然的世界”的凝视，而是聚焦生活的边缘和暗区，以勇敢的发问召唤出模糊的影子，敏锐地捕捉住它们并加以逼真呈现，以期像鲁迅先生说的“引起疗救的注意”。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商业繁荣，科技发达，人文荟萃，汇聚着时代梦想。它不仅象征着发达的物质文明、新潮的思想观念、时尚的生活方式，也包含着现代人的心灵寄托。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下，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真正接纳并安顿不断涌入的“进城者”？这也是《浮生》痛彻而深情的期待。

陈小元是作家集中笔墨塑造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他出身于贫困的西部农村，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保有知识分子的情怀。他富有正义感，聪明、诚实、善良、守信，“饿死也不背叛自己的良心”。他得罪贪官失去记者身份，拉不到广告没有收入，下班后悄悄开车载客受到指责，为了挣钱违心地给企业主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为了房子，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他甚至说，“只要你们娘俩能过上好日子，我的命可以不要”。房子就像泰山压顶，陈小元完全变了一个人，失去了活泼

的生命本能，失去了高贵的文学理想，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同为“进城青年”，陈小元与孙少平、陈金芳的性格、命运截然不同。孙少平拥有罕见的坚毅性格，相信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奋斗者形象；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是急功近利时代被“成功哲学”扭曲的“弄潮儿”形象。他们的命运都与所处时代社会氛围紧密关联，都是基于城乡二元对立的逻辑而展开。孙少平的经历表明通过改革发展可以弥合这种裂隙，陈金芳的故事则揭示现代性进程加深了这种裂隙。而陈仓在塑造陈小元这个人物时，放弃了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他进入大都市之后面临的是与“前辈们”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他“漂泊”着，在兹念兹的是房子，“房子”能使他落地生根、安身立命。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强烈的生命之痛、精神之殇。陈仓深切关注青年“进城”之后的身心安栖问题，这就使得《浮生》超越了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具有更加丰富的美学内涵。

危楼的轰然倒塌是一个偶然事件，暂时将陈小元从“纵身一跃”的绝境中拉了出来，可是并没从根本上解决“坠楼”危机。就像当年鲁迅先生发问：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收回脚的陈小元，又将如何？作家显然无力回答，因为这是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需要艰辛求解的难题。

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就像一辆大卡车在快速道上奔驰，难免出现超载、超速的情况。有时候，好的初衷和本意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可能因为个体差异，命运走向截然不同。有的人可能会因为颠簸而掉下车来，陈小元、胥小曼就属于这类人。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从来没有丧失爱、正直、善良、勇气以及与都市和解的信念。

同为“进城”青年的陈仓，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告慰着同行者。这些饱含深情且具有暖意的文字，为所有卑微的、勇敢的奔跑者立了碑，同时也向超速、超载发出了警示。（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百家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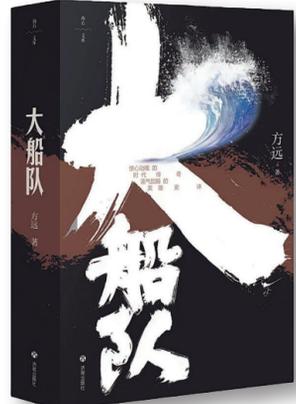
为平民英雄立传

——评方远长篇小说《大舰队》

□赵月斌

作家方远近期推出的《大舰队》以及几年前出版的大河入海流》，是两部格局宏阔的长篇“大”作。方远以“大”字当头为其作品命名，有如设定了巨量吨位的远航路线，虽然他计划中的“原乡三部曲”尚未完成，但是通过已经问世的120多万字，我们可窥见它所蕴藏的盛大气象。方远立足于家园故土，以饱蘸乡愁的如椽之笔，勾画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江海壮歌图，由此接应了中国作家延续百年的乡土想象，为当代文学的地域叙事增添了一部独具海洋气息的方氏文本。

因于历史诡谲变幻，现实无从捉摸，作家们自然“有意重新为历史作注”，将叙事、铸史的冲动化作“诗般词语”，以一种抒情风格打破空泛老套的“诗史”定式，从而给凝滞的大叙事注入极具人本色彩的个人声音。方远的原乡写作虽然无法剥离那种崇尚宏大、好为史诗的文学风尚，却也因他所擅取的家族往事带来了一种私人化视角。小说《大舰队》的着力点已非叙写那种大而化之的民族寓言，而是以演说家史的方式展开的原乡想象。作家方远作为“宏德堂”的代言人，重构了在大历史背景中逶迤而出的家史传奇。2024年2月



《大舰队》，方远著，济南出版社，2024年2月

具体来说，《大舰队》主要表现方家村方英典和方兴通父子两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跌宕浮沉和精神跃变，故事的发生地在老掖县王河两岸，作家着重刻画的正面形象是宏德堂方氏家族，贯穿始终的是方英楚、方兴运、方英典、方兴通等方家几代人身上的文化传统及精神变革。正因近代中国处于动荡和变革中，素来与世无争的宏德堂才会在时局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戰，从而打破古老乡土的层层枷锁，成为超越历史困厄的平民英雄。

既是演说一家之史，为一个群体立传，大概总难免扬善溢美的成分。方远的家族叙事固然也少不了为尊者、亲者、贤者再造金身的主观诉求，所以《大舰队》中的宏德堂，不仅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族群，而且承担着巨大的道义责任。方远说：“先人们起的堂号绝不会是信手拈来的，名称决定了方氏家族的道德与价值趋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总有一个‘德’字在萦绕，像神灵一样。”带着这样的信念，小说中的“宏德堂”几乎可以等同于方远自家的“同德堂”，他所敬畏的“神灵”自然也会参与小说叙事，甚至决定人物的命运。主人公方英典，是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完美人设，他宽厚待人，重信守诺，哪怕是对待薄情寡恩、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他也总是留有余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方家村最后一个正人君子，也是乡土中国的最后一代乡绅。

方英典支撑起了《大舰队》的精神之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的乡村精英在社会转型期作出的坚守与抉择。以方英典为代表的宏德堂拥有百余亩田地，后来又开商铺、搞海运，是富甲一方的“有恒产者”，在他身上确也拥有一滴危而不乱、处变不惊的守恒之心。这种恒心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种思想上的保守，而这思想上的保守又为他的人格操守界定了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比如，当“不孝之子方兴通背信弃义，任婚约于不顾”时，他即认为这是“失信、失义、失德”之举，因此特意来到方氏祠堂，逼迫方兴通在祖宗牌位面前悔过听命。对他来说，既然先前有过婚约，就是板上钉钉的君子协定，尤其是在对方家道中落的时候，更不能言而无信，哪怕儿子对此极不称心，也不能做出不仁不义的背德之事。通过祠堂逼婚，大可看到民国初年的方英典仍旧恪守宏德堂的堂规家法，不仅保守，而且保守得迂腐、顽固，所以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方兴通眼里，分明就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简直就是蛮不讲理、面目可憎的暴君。

然而，在这“保守”的另一面，方英典又是头脑清醒的开明人士。比如，同样是带方兴通祭拜方氏祠堂，却是为了烧毁先父的遗囍，打破海上船运的祖宗家法。假如他没有违抗父命的勇气，恐怕渤海湾永远也不可能有方家的大舰队扬帆出海。宏德堂方家大概只能世世代代充当农耕文明的孝子贤孙。再如，他把儿子送到济南学习商业管理，他亲自带领两条货船开到大连采购木材……这些都可看出方英典是一个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干家。不仅如此，他的开明甚至还表现在对先前保守行为的大彻大悟上——当得知方兴通的前女友方秀芝被关进牢狱时，他反而理解了儿子当年的抗婚之举，因而释怀前嫌，并大力支持儿子展开营救行动。经此一变，不但父子和解，方英典也卸下了祖传的金科玉律，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精神觉醒。凡是种种，有如乡土中国最后一代乡绅的回光返照，既体现出一种难以复制的人性的光辉，又像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方英典介于落后和进步之间，集保守和开明于一身，他因来自旧营垒而知其常，又因走向新世界而达其变；他在前程未卜的艰难时世坚守最后价值，也在天下兴亡国仇遇到家恨之际选择死生之大义。所以，有张有弛、有破有立的方英典和他所代表的“以文持家以德持家”的宏德堂，足以堪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守护人”，旧伦理中新思想的推行者”，他们是保守中国乡土文明的最后一代，也是开拓中国现代文明的第一代，他们创建的“大舰队”正是乡土中国重获新生的真实缩影。

《大舰队》因史言志，尽管身为方氏子孙的方远需要用个体的小事发明一种“想象家世的方法”，需要用春秋笔法化腐朽为神奇，需要给逝者“平添一个光环”，但他的原乡确乎值得审视、反观，他的家史传奇确乎值得注之以诗情，铭之以金石。就像小说结尾遭遇风浪的大船，他的原乡故事还需要探及深海，如此，才可见证麒麟的奇迹。（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三味斋

王筠长篇小说《阿里郎》的故事讲到最后，曾经的紧张和担忧都消解了，欣然复坦然：赵玉兰老奶奶终于活出了头，她的抗美援朝战争参战经历得到认可，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补偿，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沂蒙山的汶水河畔颐养天年；少年走失的三女儿赵槐花与母亲重新团聚，报告其幸福一家人的好消息；含冤而逝的表哥朱贡献多年来湮没无声，他的遗孀子朱汶水归乡祭祖，追寻和温故其父的沂蒙岁月，认祖归宗，这一切都让赵玉兰大喜过望。最激动人心的是，她和丈夫皮特·路德与儿子赵跃进也在视频上隔洋相见，了结50年不通音信之苦。刀兵相见的朝鲜战场，还乡后跌宕起伏的爱情与亲情，流落彭城艰难求生和收养赵槐花的甘苦备尝，到当下的儿女成行久别重逢，这让赵玉兰，也让作为读者的我们，不能不感慨系之。一位共和国的有功之臣，“最可爱的人”，遭遇近半个世纪的悲辛，在年近90岁之际，才迎来命运的峰回路转，得到应得的命运补偿。刘禹锡的两句诗“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不禁涌上心头。

军旅作家王筠近10年来致力于抗美援朝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迭受好评，《阿里郎》是继《长津湖》《交响乐》之后的第三部。时移世易，从激烈的战场拼杀，到战俘营的非常岁月，再到战争结束后数十年间的恩怨情仇，从鸭绿江两岸，到太平洋两岸，作品展现的时间空间与张力都要比前两部小说庞大许多，人物的角色划分和命运走向也开出新局面。皮特·路德等美军战俘拒绝遣返，自愿前往新中国生活，并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管理所救过其性命的赵玉兰结婚，由此勾画出几个小人物在时代风云中的生死浮沉。皮特·路德是孟菲斯的黑人少年，是黑人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读王筠长篇小说《阿里郎》有感

□张志忠

女性遭白人男性强暴所生，他从小受尽种族主义者的欺侮，为了逃避白人迫害而加入美国陆军来到朝鲜战场，但在美军中仍然有相当严重的种族歧视，不仅物质生活待遇低人一等，甚至在战况危急之时几乎被抛弃，以致他所在的黑人连队集体向志愿军投降。有这样的前因做铺垫，这让皮特·路德后来选择留在中国顺理成章，也加强了作品的传奇性。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1950年11月至12月发生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39军116师347团以军事打击加政治攻势，迫使美国陆军第25师第24步兵团一个黑人连100余人集体投降，是为抗美援朝战争浓墨重彩的一笔。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曾有22名美国和英国的战俘放弃返回自己的国家而选择到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定居，不少人在中国成家立业，感受着中国人民的宽容、善良与爱，过上了体面而稳定的生活。由此可见，《阿里郎》不仅传奇，也有着坚实的史料基础。

从沂蒙山走出来的志愿军女卫生员赵玉兰是《阿里郎》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勇士百战，胜利归来，她和同样在战俘营做翻译管理工作的表哥朱贡献卸甲归田，但想象中的光环并未从天而降。朱贡献因为被欺骗，曾加入过国民党军，这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赵玉兰因皮特·路德“美国特工”的污名遭受牵连，他们都难以平稳地度过“文革”岁月。加上在长津湖战场因为冻伤被俘截肢的瘸子刘三，这3位沂蒙山的儿女，没有体验到从朝鲜战场凯旋的喜悦，却因为各种缘由受漫长时代的狂澜冲击而饱经磨难。一系列

的遭遇让朱贡献失去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而选择自我了断。对于赵玉兰、瘸子刘三等，以及朱贡献的遭遇因晓雨，怎么样在艰难的时代中活下去，这是比死亡更为严峻的考验。小人物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但心中的善良与希望没有泯灭。赵玉兰和瘸子刘三在自身生存都陷入危机时，先后收养了4个孤儿，靠捡垃圾把孩子拉扯大。上海姑娘闵晓雨虽然性格软弱，却坚持生下朱贡献的遗孀子朱汶水，并让他记住自己的父亲，有朝一日回到沂蒙山老家认祖归宗。皮特·路德在华多年，仍然是美国公民，不曾做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回到美国，在有关方面的“策反”下，他也不肯违背良知诽谤他的爱人所在的中国。赵玉兰和皮特·路德相隔大洋大海，几十年不通音信，但两人的爱情却那样深切，不可泯灭，那一声“俺——娘——咪”，蕴含了多少深情与思念。

这正如王筠所言，爱比战争更长久。唯其如此，作品才得名《阿里郎》，这一首歌唱朝鲜族青年男女动人爱情的歌曲才会贯穿作品的始终。它是赵玉兰和朱贡献两人在生死搏杀的朝鲜战场上学会的，也是赵玉兰走过种种人生不幸迎来柳暗花明的岁月而始终相伴的，是逼仄生存空间中对自己向往的一种放飞与憧憬。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曾说：“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赵玉兰、朱贡献、闵晓雨、瘸子刘三和皮

特·路德等人的人生历程，正是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生动的显现，是鼓舞他们自身和更多的后来者能够穿越苦难、绝望、毁灭的精神支撑、心灵支柱。时至今日，我们再一次面对全新的挑战，面对种种困厄与危局，《阿里郎》能让我们获得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沂蒙女性，可以作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关键词，这在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三部曲”中都有鲜明的表现。从18岁参军入伍开始，王筠在沂蒙山先后工作生活了26年，如今虽定居北京，但他还会经常回到沂蒙山区，他将这里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种沂蒙情结和情怀，在他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创作中均有不同的体现。如《长津湖》中的大个子机枪班长孙友社和医院治疗队护士李桂兰，《交响乐》中志愿军某部军直侦察营营长李八里的妻子，同样驰骋在朝鲜战场的沂蒙女儿王翠兰等。在《阿里郎》中，作者将沂蒙女性推到文学的聚光灯下，将赵玉兰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主人公，展现其苦难而辉煌的一生，在王筠是第一次。沂蒙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坚强根据地，出自作家刘知侠之手的《红嫂》，出自作家朱秀梅之手的《远去的白马》，在不同年代里为沂蒙女性立碑造像，都深受好评。《阿里郎》跻身其中，毫不逊色。可以说，《阿里郎》是长期生活、工作在沂蒙山区的军旅作家王筠，对这片热土、对沂蒙山父老乡亲的深情回馈。（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荣誉教授）

一部“中国式地理”的叙述样本

□张同

我熟悉作家李鲁平的部分作品，读完这本《长江这10年》，又觉得他很陌生。陌生于他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发现，陌生于他对纪实文本的创新。深感他也像浩荡东流的长江一样，看似熟悉，却又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

另辟蹊径的新视角。这本书通过对长江两岸10年来农业农村、工业环保、长江大保护、治水治江、城市面貌等5个领域的近距离扫描，并在其中贯穿对长江文化文明的讲述，向读者呈现了一部“中国式地理”叙述风格的长江地理样本。作者没有去正面讲述长江流域农业农村的成就，而是着重于讲述水稻、油菜种植的进步，乡村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个案，来呈现长江农业文明在新时代的赓续与发展。作者通过写江豚保护中的典型人物、沿江化工企业的搬迁、南水北调水源保护等个例，折射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氛围以及全社会为长江大保护付出的努力。历朝历代，治水都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作者侧重10年来金沙江清洁能源走廊的打造和三峡后续工程的建设，在书写中尽量避开人们已经熟知的长江印象，而是讲述大型发电机组的进步、长江岸岸护坡工艺的进步等过去讲述的比较少见的细节。在呈现长江这10年的变化之中，作者用独特的视角，打开了一个让读者洞察长江变化的文化通道。用李鲁平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次长江文明的寻根之旅，

也是一次深入当代长江的感受之旅，更是一次长江故事的讲述之旅。”讲述长江故事的方式很多，像李鲁平这样用眼力、脚力、心力、笔力讲述的，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与长江文明的博大精深相匹配的。

农业文明的新叙事。长江流域是农业文明的摇篮，从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到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一个个远古遗址向人们呈现了长江流域水稻驯化的过程。李鲁平在对长江流域农业文明的回望中，通过对近10年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等一个个案例的描述，让读者看到长江沿岸当代农业文明的进步。

书写生态的新气象。在这本书中，作者无论是讲青铜器历史文化渊源，还是讲工业文明的发展，无不以生态的视角展开叙事。也就是说，落脚点仍在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上。这本书中，关于长江沿岸关闭化工企业的数据，让人为之一振。“临湘市12家农药化工企

业被要求停产关闭”“常州拆除化工企业45家”“2017年到2018年，江苏省关停化工企业2600多家”“从2017年起，宜昌市决定对134家化工企业分类采取措施，34家关停，100家搬迁改造”等，沿江各地一项项行动汇成声势浩大的长江保护交响曲。

融入长江的新境界。李鲁平曾在他的诗集《桂古73》中，把芦苇视为兄弟。很多读者感到困惑，芦苇就是芦苇，怎么会是兄弟呢？在《长江这10年》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芦苇是一种抗逆性较强的植物，不仅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而且还有较强的抗污染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芦苇抵抗外界恶劣环境的能力较强，能够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下生长。比如，芦苇对含酚、油、硫化物的工业污水有较强的耐受性，能在碱性的造纸废水中生长发育良好。由此，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污水沟、臭水沟里芦苇照样可以活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在河床破坏、水体污染的现实中，“如何守护好一江碧水，一个企业、一个乡村

可以有所作为，一根芦苇、一个志愿者可以有所作为。”可见，作者把自己当作长江边上的一根芦苇、一滴江水、一条行船，用不同的视角解读长江，与丰富的时代信息和内涵相贴近，也与读者的阅读需求更贴近。

这本书中还穿插了诸多的科普内容，如我国四大重要粮食产区：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一江两湖七河：长江干流、鄱阳湖、洞庭湖、岷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汉江、大渡河；瑞昌市的“五朵金花”：夏畝铜岭的铜草花、武蛟乡的油菜花、洪一乡和肇隆镇的桃花、横立山乡的梨花、南阳乡的荷花……这种“中国式地理”的呈现，也是一种纪实文本的创新。

如果没有对长江深沉的爱，没有多年在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和人生阅历上的厚积，没有对文本驾驭的娴熟，没有对生态保护的敬畏，也许《长江这10年》就不会如此厚重地呈现长江的精彩。（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